

中国基督教大学从外国式到“中国化”的转折及其启示

——华西协合大学从异质到本土身份的递进*

张丽萍

基督教在华设学，以 1839 年澳门马礼逊学堂为嚆矢，教会学校竟日盛月增，并直达大学的“象牙塔”，在西南则有华西协合大学，是为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之一。因其“根在外国，权在教会，西人为主，外国方式”而迥异于国内公立学校。以 20 世纪 20 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为契机，基督教大学阶段性完成了其“异文”“异种”“异教”的“中国化”变革，成为了中国教育系统下的私立大学，这既是它们针对时代挑战的应变，也有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求变。

关键词：基督教 收回教育权 华西协合大学 私立大学

作者 张丽萍，1965 年生，历史学博士，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。

清末时际，侨居四川的教士借“新学”大兴的浪潮，联合英美加三国四差会之力，在成都创立了华西协合大学。自 1910 年大学立校之始，“借本校之力，建天国于斯土”的宏图一直未改，^①但“斯土”却无时不在警醒与改变着这所大学。前十余年间，它不受约束地自由发展，在城南“独围一隅”“自为风气”，自诩为“华西第一学府”。20 世纪 20 年代后，“收回教育权”一致同倡，令教会教育有不攻自倒之势。在政治合法性遭到破坏，以及它的法律危机、社会危机亦无法自我破解的压力下，在时代牵制、法令强制的作用下，华西协合大学迈入从渐变到质变的转折时期——开始从纯粹外国差会的宗教学校过渡到中国归属下的私立学校。

一、国权、教育权与“文化租界”“教会堡垒”

在 1922 年巴敦调查团报告中，对在华教会学校以一言蔽之，“此等学校为泰西教士所创设，得泰西捐款以济之，恃泰西和约以护之，因而得任其维持一种标准，适如主事者之所志，且遵泰西法律上条件，而注册受特许焉”。^②此段刻画出自教会人士，可见其客观公允。如此以来，教会学校难免被国人定义为“宗教学校”“化外学校”，有“教会堡垒”“文化租界”等种种说法，斥责它们“奴化青年”“培养奴隶式人才”。

* 本文系 2008 年度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精品培育项目“教会大学在中国的本土化——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例”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 杜焕然：《华西协合大学对于华西教育会教育部之报告》，载《华西教育会年会书》，成都：华英书局，1916 版。

② 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纂《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》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22 年版，第 102 页。

1919年,国际欧战结束,国内新文化兴起,正所谓“强权失败,德意志为城下之盟,公理战胜,北平树不朽之坊,是故帝国主义之势力,业已崩溃,民族自主之精义,早行亚欧”。^①以“五四运动”为契机,“国人原痛恨外交失败之奇耻,遂乘势攻击西教士不遗余力,基督教亦大受抨击”。^②紧随其后,国共合作,北伐军兴,取消不平等条约,铲除外国租界,成为瀚雪前耻、复兴民族的尊严之战,列强在华的教会学校与殖民学校遂成千夫所指,其中“打倒文化侵略”与“收回教育权”的呐喊,道出了中华民族争国权、求平等的正义之声。

(一) 从“侈然自负”转而“风雨飘摇”

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收回教育权运动,教会人士率多缺乏心理准备,因此将之形容为始料未及,自叹陡然进入风雨飘摇之中,教会教育事业也陷于被疑遭反的窘境,竟有不可收拾之势。

对于基督教在川事业而言,1901年后的二十余年是历史上少有的稳定时期:民教之间尚觉平静少事,各差会致力于事业的拓展,互相攀比,无暇顾忌国人的侧目,亦不受中国政府的制约。教会学校因此得以稳定地将已有事业“发展至完善地步”;加之民初以来,省内政局紊乱,公立学校日趋沉寂,教会学校遂相形见好,“彼校中人不免侈然自负,几疑天下之美,为尽在己,一世之才,为出自己。”^③

在华西协合大学历年的报告书中,学校当局多次谈到种种“光明之象”,这样的岁月持续到1924年,“遍观中国全境,或特视吾人所居之一省,皆臻分崩裂析不安之状,而本校独能和平进行”,“大学校园内,时而礼拜,时而功作,时而游戏,和平进步与秩序充满其间,无时或断也。”在一片感恩和誓愿声中,华西协合大学迎来了新的一年:

建立大学,神圣之事业也。为此偏远之华西数千万人民造成新基督教的文化,诚一伟大之事业,吾人焉敢不自勉乎?^④

正是该报告书公开发行的1925年,收回教育权运动如大潮般席卷而来。

(二) 谣言与口碑中的华西协合大学

外界舆论集矢于教会学校,猛烈攻击其“死穴”所在:对于梯山航海而来的西国教士,一概以“异族”度量;对于“挟约章而来”的教会学校,莫不以“国耻”作为标签;对于“日日诵新经”“日日读西史”的教会教育,率以民族危亡和国家前途相警告。早在1915年,《四川旬报》刊文警告:教会学校“卵育危心,毒志昭若日星,国人思之,国人重思之!”^⑤对川人来说,这所不受政府管辖,而由教会提供资金,口口声声地宣布要“促进天国事业”的大学,是不祥和有害的,乃是“成都基督教大本营,洋鬼子巢穴,青年同胞们卖身处”。^⑥

华西学校“洋人”的可疑、可憎,时常招致舆论的讥嘲怒骂:

为什么华大的洋人,傅士德、戴谦和,在暑期内,不在避暑山庄里,安安逸逸地避暑,偏要跑到打箭炉、巴塘、理塘、大凉山一带边地去,测量地形、考查矿产呢?为什么华大的洋人,路禹门等,把“满人的卖淫生活”等有伤国体的事情,都拿回他们本国去报告呢?^⑦归结起来,“华大为洋人藉以刺探国情,实施阴谋之机关”,“华西学校为侵略四川之根据地”。^⑧火药味十足的舆论,汹涌的不安情绪,一旦借机发难,将蔓延为不可收拾之势。而学校对外缺乏

① 《反对华西大学筑城团宣言》,《惠通周刊》1930年7月26日。

② 严恭寅撰,许梦九译《现代非基督教运动之原因》,《华西教育季报》第3卷第4号,1925年12月出版。

③ 《今后华大同学自救自励当取之端倪》,《华大学潮特刊》,1926年出版。

④ 《华西协合大学上华西教育会教育部年会的报告》,《华西教育会年会书》,1924年版。

⑤ 冷僧:《惊心动魄之要求条件》,《四川旬报》第1年第1期,1915年4月出版。

⑥ 《岷江大学学生会反基督教宣言》,《庸报》,1929年12月19日。

⑦ 持平:《华西大学是否文化侵略的机关》,《华大学潮特刊》,1926年出版。

⑧ 《新四川日报》,1930年8月28日,9月9日。

应对联络，内部师生间少有融洽疏通，使隔阂日深，误会易起，终至酿成事变。

（三）基于国权下的教育权

“教育权”包含受教育、施教育的人权和国权，收回教育权运动特指的是国权语境下的教育权。收回教育权广义上包含了所有私立教育——如教会私立以及民间私立等，但是收回教育权运动矛头指向的却是当时的教会学校和殖民学校——殖民学校特指日本在东三省所设的学校。是时，非宗教思潮、共产主义、国家主义奋激勃发，对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，剖析发端原委，求问利弊所在，倡议除害之道，此三种思想混合起来，成为收回教育权运动之主因。另外，还受到了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，如1924年土耳其取缔境内外国教会学校，明确宣称，不撤去十字架，便封闭学校，令行之下，教会学校绝迹于境内，其决绝之手段，震撼了中国教育及思想界，遂有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之《请求力谋收回教育权》《请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》等三案。

对于教会学校的批判，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：

1. 侵害主权：指出教会学校既不呈报官厅注册，复不接受官厅之考核，侵害我国教育主权。

外国教会在外南所办之华西大学，固于前清末年，以蒙蔽及威吓手段，在照政府略有据案，及民国有教育部之设立以来，并无只字存查，而同时反在美国教育部备案，以美国教育行政之计划，强我国民以服从，是不啻以美国之政权，施及吾国领土，而将吾国人民统治之，其辱我国权，莫此为甚。^①

2. 违背教育宗旨：指出基督教在华设学，其教义与中国国民思想冲突，设学要旨在于陶冶符合基督教的人才，因此，对于这种违背国情民俗的教会学校，亟应取缔。

该校不恤违背教育定章，而有神道科之设，而非神教之各系，每日必读圣经，每周亦必做礼拜，是何异于耶教之麻醉机关，而直接向我国民麻醉。^②

3. 文化侵略：指出教会学校与帝国主义的内在联系，是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先锋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西国教士公开发表的言论，诸如“中华归主”，愈加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。

华西学校为西南文化侵略之大本营，事实□□，已不可讳言矣。盖其铸造洋奴，分发各处，实行麻醉人心，软化民性，以遂亡我国、灭我种之野心。此种万恶机关之不容成立于境内，早为各界人士所公认。^③

二、社会推动力：与四川社会的三次冲撞

从1925—1931年，华西协合大学犹如一叶孤舟，数次卷入社会冲突的急流之中。如果从事件的发端来看，或因校内“文字隔阂，致生误会”，或因与外校学生间的“龃龉”，或因学校当局于校址“添筑短墙”，看似细枝末节，然而社会的回击却异乎想象的猛烈，并一致汇流入宏大的反帝爱国政治运动之中。

（一）历次冲突事件

1. “华大学潮”：1926年10月1日，华西学生因英舰炮击四川万县造成“九五惨案”，集会游行并发布《对万案之宣言》，文称“誓不与英虏共戴天地”，并有“蠢尔英夷，虎狼成性”等语句。美籍校长毕启（Joseph Beech）认为学生言行有伤英国尊严，戟指言骂：我们英美人出钱

①② 《收回华西学校运动会呈省府公文》（1930年8月27、28日），华大档案·“筑墙”。按本文所用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档案（简称“华大档案”），现为四川大学档案馆收藏。

③ 《警告运动华西学校复活之洋奴及退出后犹思返校之同学》，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《万县九五惨案》，成都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，1986年版，第187页。

出力,远来中国,兴办大学,养活你们,教育你们,可谓恩深义重,你们也跟着别人胡闹,骂起我们来,你们还有良心吗?事后,毕启就其言行失当向学生公开道歉,仍有部分学生“伤国势之穷蹙,痛文化之侵略”,愤而退学,复联合组成华西四校退学学生同盟会,人数共约五百余人。20日,英美等国教会所雇华工依“罢工公约”不再给“仇人”作工,加之全市商贩履行不接济食品给英国人的“市民公约”,华西师生艰窘万分,暂行停课。续经成都士绅居中调停,英国代表与中方代表签订“调解协议”。11月8日,华西四校复课。

2. “收回华大教育权”:1929年12月5日,有成都蚕业专修科学生拍照华西协合大学女学生,引发双方的“龃龉”,成都蚕业专修科学生会以受“洋奴”侮辱为由,于7日向华西协合大学抗议示威。继而,风潮扩大,11日,成都蚕业专修科、岷江大学、民立大学、四川大学学生共千人,在华西坝草坪召开反基督教运动大会。继后各报相继刊载各校学生会的宣言,并有岷江大学、四川大学、六一社、非基督教同盟等120个团体,于18日成立四川各界反基督教大同盟,宣称“收回基督教在华教育权”“收回华西学校为国有”。华西协合大学因此停课十日。

3. “捣毁华大围墙”:1930年5月30日,英籍教授苏道璞(Clifford M. Stubbs)在校内被匪劫杀,后经军警侦缉,捕杀罪犯3人,即“苏道璞遇刺事件”。为消除隐患,学校当局决定于校址添筑围墙、增设门屏,并接奉驻防成都的二十四、二十八、二十九军三军部的会印条令,令开:“华西大学操场系属该校学生演习之地,本军各项部队均不得入内操演,并对该校建筑门墙,无论何人不得损毁。”^①四邻乡民联名呈递华阳县政府,具控华西学校掘土筑墙,将道路阻断,且挖断沟渠,有碍农田灌溉。一时舆论哗然,有称西人“挖壕筑城”,有称该校“招练武装巡捕”。就此,成都市各界民众反南台寺筑城大会发出“通牒”,限其自行拆毁,否则率众捣毁门墙,并借此时机“收回该校地址,以绝后患”。学校呈请省会军政当局作主,然割据成都的几方势力却各怀居心,如二十八军(邓锡侯部)表态:筑墙一案是有限制地批准了的,因为保护是我们应尽的责任,禁止下操亦有正当理由;二十四军(刘文辉部)则称:该校筑城未在本军部存案,此案人民若起而主张,军长极愿扶助。^②8月1日,成都市民分路奔向华西学校,将其新筑门墙及旧墙推毁。

(二) 对历次事件的评叙

1925—1931年的冲突事件,史料数量极其庞大,如公文、信函、笔记、报刊等,但是因各方立场与观点的对立与分歧,各自书写的“历史”迥然不同。

1. “谣言”与“真相”的辩诘:对于1926年“华大学潮”,西国教士将其认定为“红色的”排外运动,“据内部可靠信息:这是整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计划的一部分。3万元,甚至30万元已经运抵四川,作为这场运动的宣传经费。红色运动的目标之一,就是驱赶外国教师并占领这所大学”。^③由成都市民发动的对华西坝持续两周的封锁围困,成为西国教士难以忘记的羞辱,英国总领事甚至将此看作是“针对妇女和儿童的一场战争”。^④对于“愤而退学”的华西学生,西国教员也轻蔑以对,“那些退学者中,多数就是不良之徒,而留校者则是忠贞的基督徒”^⑤。一些中国教员也拿“现在的学生,去担天下兴亡,谁来负读书的责任”的冷峭话来禁止,拿“学生只知道破坏,不知建设”的悲愤话来讥讽,并以个人前途来警告学生,“求学时大呼救国

① 《国民革命军二十四、二十八、二十九军军长刘、邓、田令》,华大档案·“筑墙”。

② 《为华大筑墙事访问各官厅记》,《新四川日刊》,1930年7月30日。

③ Joseph Taylor, *History of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(1930—1935)*, Chengdu: the Canadian Mission Press, 1936, p. 45.

④ “The Chengtu Boycott”, *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*, 1926, No. 12, pp. 14—15.

⑤ “Report of the Senate of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to the Board of Governors”, *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*, 1927, No. 9, pp. 13—19.

的志士，毕业后社会淘汰，人格无存，更自需人解救”。^①学潮期间，美籍校长毕启被学生押着，前往事务所去退学费，“苦心经营的大厦萧条了，教室里没有人影，数十座华丽的楼宇，已成了尸骨塔一般鬼气阴森”，毕启长声叹息：

主啊！你的仆人，远离美国我的故乡，来到中华，设学于成都，差不多二十余年了，记得二十年前成都此地满处皆是枯坟，满目皆是荒凉，你的仆人啊！东奔西驰，作一个长期的乞丐，募集多金，侥幸成了今日的这样的华大。主啊！这不是我在黑夜里旅行不平坦的途程，所得的代价吗？^②

回顾晚清“教案”时候，教会人士纷纷指责仇教者的野蛮愚昧；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时候，他们又历数自己惨淡经营，反陷于被疑遭反的窘境。

1930年的“华大筑墙案”，学校当局仅就“添筑门墙”一事自辩自清，以“事实俱在”来辟谣，以“别无他图”来辩污，无奈依然还是谣言四起、真相难明；而反对华西筑墙的社会各界，则延伸或放大了“筑墙”的政治含义，使“筑城堡、练巡捕”之非议，愈传愈真，令“争国权、抵外辱”之风潮，愈演愈烈。对此，学校当局怪罪于成都“环境太劣”，与沿海都市大相径庭，指责成都各报采取封锁政策，所登载者只有反对者的一面之词，责难反对者制造恐怖之言，煽惑无知青年，竟使“莫须有三字，成为铁案”。^③数次冲突事件，起于青萍，却掀起波澜，固然有各种团体、党派、政治势力在其中运作和策动，但是之所以一呼百应，内外夹攻，一是国权的刻骨之恨，一是国民的自觉意识，如1929年岷江大学学生会宣言中提到，“此次洋鬼和洋奴侮辱蚕专与中文院同学，不是寻常人与人间的微细侮辱，而是整个的中国、次殖民地的中国，受了帝国主义的侮辱。我们为蚕专与中文院复仇，即是为本身复仇，为中国民族吐气”。^④1930年成都市民捣毁华大“城墙”，为的是彻底祛除“围墙高耸、俨然敌国”的耻辱标志，“为争国际地位计、为争国家主权计，不能不据理力争，以弥补政府力量之不逮，而尽国民之天职。”^⑤

2. 政治力量的权谋与应对：在军阀割据的防区时期，四川没有产生什么“模范长官”或“基督将军”，却出现了绰号“巴壁虎”（刘湘）“多宝道人”（刘文辉）“水晶猴子”（邓锡侯）“冬瓜”（田颂尧）等实力人物，在四川和全国都声名狼藉，但是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外国人“可以信赖的朋友”。最受欢迎的是曾任省长的杨森，“五卅运动”期间，由于他的保护，使西国教士对成都及其周边的“和平与恬静”感到非常满意。在杨森失势后，省垣成都由刘文辉、邓锡侯、田颂尧共同管理。1926年的“华大学潮”期间，美籍教授周忠信（J. Taylor）就指控四川军务帮办刘文辉对基督教怀有“敌意”，指使部下参与并组织了学潮和工运，“控制成都南门区域的刘文辉，宣称这场暴乱是爱国运动，他是不会加以阻止的。此人多次向其部属授意，让那些人闹腾去吧，无论如何，总该发出点声音来。”^⑥另外，包括省长公署、清乡督办署、教育厅、省议会等，有的出面协助华西大学退学团，有的对退学行动表示嘉许。时任刘文辉军务帮办公署副官长、参与调解谈判的中方代表李铁夫著文称，学校当局“情愿把华大全部校产作价三百万元，由四川地方政府予以收买”。^⑦但就整个国际、国内及川省政局来看，教会学校远未到破产、

① 波：《与教职员们谈青年的政治运动》，《华大校刊》第2号，1927年出版。

② 杜明义：《退费》，《华大学潮特刊》，1926年出版。

③ 《呈陈明经过事实及误会情形并请派员履勘明真象》，华大档案·“筑墙”。

④ 《岷江大学学生会反基督教宣言》，《庸报》，1929年12月19日。

⑤ 《反对华西大学筑城团宣言》，《惠通周刊》，1930年7月26日。

⑥ Brewer, “Report on the Shanghai Incident, 1925—08—01”, *Morgan Papers*,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部藏：The United Board, Box 1 (A-Clay); Folder Brb-Brh.

⑦ 柯仲生、李铁夫、李静轩：《成都华西大学学生反帝退学运动》，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》第8辑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79年版，第129页。

停顿的最后关头。美籍教授莫尔思(W. R. Morse)分析了当时的三股势力:一是具有亲共倾向的社会主义者,他们希望“窃取”这所学校占为己有;二是军方不允许借机夺取或瓦解这所学校;三是绝大多数民众保持“冷漠中立”,希望一切照旧,维持现状。莫尔思认为“这就可以部分解释我们的处境并不是那么坏,也说明我们为什么没有遇到更大困难。”^①四川军政当局对华西协合大学既不能令其停办,又不能收回自办,也无力筹集巨款“予以收买”。如1927年秋,省内公立各校竟到无款开学的地步,遑论收回教会学校自办。鉴于种种不堪之虞,中方代表只能就维持现状之下,讨论限制西人权力,限制神学课程等问题。与此同时,军政当局也着力避免事态扩大和风潮蔓延。1926年10月19日,密报服役教会之华人即将发起罢工,四川交涉署提请警察局加意弹压,免生意外。罢工期间,华西坝出现骚乱迹象,教育厅厅长呈请军政首脑设法制止,以免酿出重大外交事件。1927年初,英美领事电令侨民撤离,以免类似于“庚子拳乱”的血案再次发生。3月8日及9日,刘文辉、邓锡侯分别致函副校长宋道明(G. W. Sparling),刘文辉在信中说“作为省会成都的最高长官之一,无论发生什么情况,我都会为所有外国侨民提供帮助和尽可能的保护,这是我的职责所在。”邓锡侯也在信中表示,“我将尽最大的努力为贵校提供保护”。^②1927年4月,《华西教会新闻》在谈到四川局势时称:“四川是当前中国最为平静的省份之一,成都肯定比上海更为安全。”^③

三、法令强制力:政府的指导和监管

民元以前,对于外人所设学校漫无限制,听其自然发展,政府的法令疏失和颀顽放任,是教会学校日益扩充、不受约束的根源之一。民元以后,开始进入对教会学校的法令限制时期,教育当局虽有私立学校的立案规定,但适用到教会或外人所设学校便如同空文,申请政府认可的学校寥寥可数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进入收回教育权的实施时期,一面施以限制和取缔的威权,一面加以考核和补助等手段,行使了对教会学校的法令之责、监管之责和指导之责。

1912年11月北洋政府颁布《公立专门学校规程》,规定私立专门学校的设立、变更、废止等均须呈报教育总长认可。1913年1月教育部发布《私立大学立案办法布告》,要求私立大学限期报部审查,成绩良好者准予立案。1913年12月教育部发布《取缔私立大学之布告》,主要涉及江苏、浙江、安徽三省的十八所私立法政大学和专门学校,而对教会大学并无制约作用。其后,1917年教育部订立《中外人士设专门以上同等学校考核待遇办法》,只要教会学校请求考核承认,政府以宽大为怀,不分中外,一视同仁,准予依照私立学校手续办理。同年5月,教育部公布《私立各种学校考核待遇法》,令各私立学校一律立案。1919年3月教育部发布了外国人所设专门学校毕业生待遇办法规定。1920年11月教育部公布《外人设立学校须如法报部立案》,申明外人设立专门以上学校,准照大学及专门学校各项法令规程呈部核办。次年4月又重申前令,催促立案,并颁布《教会所设中等学校请求立案办法》六条。1925年11月教育部颁布《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》六条。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也在1926年10月颁布《私立学校规程》《私立学校董事会设立规程》及《私立学校立案规程》,作为收回教育权的准则,却并未颁布相关的法令予以强制执行。大学院时期,对这些法令进行了修订,1927年12月公布了《私立学校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》,1928年2月又公布了《私立学校条例》和《私立学校董事会条例》,使法令体系日臻完善。大学院改组教育部后,将前颁私立学校规程、条例等加以合并,

① W. R. Morse, *The Three Crosses in the Purple Mists*, Shanghai: Mission Book Company, 1928, p. 163.

② Lewis C. Walmsley, *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*, North Newton, Kansas: Mennonite Press, Inc, 1974, p. 166.

③ “The Situation”, *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*, 1927, No. 1, p. 43.

修订为综合性的《私立学校规程》，于1929年8月29日公布。

国民政府时期所颁法令，值得注意的有三：（一）给予外人所设私立学校以合法地位，但其行政须操于中国人之手；（二）贯彻宗教与教育分离，而与政治结合的理念，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，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宗教仪式；（三）对外人所设学校购置地产加以限制，只能专用于扩充学校校舍。同时，以更积极有效的行动来处置未立案的学校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：

1. 屡令各省教育机关遵章办理

1928年6月，大学院训令各省区教育行政机关：

各私立大学业经遵章呈请立案者，尚属寥寥，殊属玩忽之极。所有各私立大学应飭即日遵照条例造具表册，呈由各该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明，转呈本院立案，毋再延逾。^①

1929年1月，教育部训令各省区教育行政机关：

已经设立尚未呈请立案者，无论曾否报经前北京教育部核准立案或试办，均一律促其速行遵照立案条例呈请立案。^②

四川教育当局对教会教育的危害性均有认识，如教育厅厅长向楚言称“外人在华自由设学，久为国人所非难，故职厅对于川省教会所设学校请求立案，尝予分别准驳，务令遵照吾国法令办理，取缔綦严”。^③

2. 未立案学校不予公费补助

1928年12月，教育部颁布命令1929年6月后尚未呈经核准立案者，将被停止公费补助。

3. 警告学校立案与否的利害关系

1929年5月，教育部警告学生勿投考未经立案的私立学校，1930年6月，教育部颁发命令，未立案学校学生不得与立案学校学生受同等待遇。国内各报刊亦将已准立案、已令停办的私立学校公布，劝诫学生投考时详加审慎。

令行之下，燕京大学、东吴大学分别在1929年被核准立案，1930年则有岭南大学、金陵女子大学被核准立案，故有学者评论称：“教育部每公布较强制性的禁令后，就有教会大学呈请立案被准，可以证明施加压力对于督促教会学校立案是有效的”。^④

4. 设定立案的最后期限

1931年8月，教育部发布训令私立学校立案最后期限为1932年6月，否则将飭令停止招生或勒令停办。

5. 停办“不良之私立学校”

如上海，先后令飭停办者，有群治、东亚、新民等九大学及南洋医学院，北平有郁文等三大学。

四、内部驱动力：教会及校内的多方角力

由外界舆论加诸于身的种种罪名，如谓教会教育为“帝国主义之俵”，教会学校是“传教性质，是愚民政策，是外人殖民作用”，使教会学校骤然丧失了在中国生存的合法性，并以此攻击迫使学校及教会人士做出回应。

① 《四川省教育厅训令第7072号》，华大档案·“立案”。

② 《四川省教育厅训令第64号》，华大档案·“立案”。

③ 《电大学院请核示教会学校设立师范学校科可否照准一案》，《四川教育公报》第2卷第2册，1928年4月出版。

④ 吴家莹：《中华民国教育政策发展史》，台北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，1984年版，第273页。

(一) 中国群体：为求存而自辩

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浪潮、不绝于耳的“非基”“反教”声浪，中国师生以及这所大学的中国朋友，“挺身拯救了这所学校”，并为捍卫学校的荣誉而与外界笔墨交锋。对于这些中国人士，不可如当年舆论所斥“侵化为奴”，他们同样关注社会动向，思索学校之前途。

1. 对于国民心与爱国心：1926年“华大学潮”期间，部分留校学生家庭发表宣言，公开支持子弟不加入退学团，自辩说他们“大半是书香门第，世宦之家，决没有一个与洋人有丝毫关系，我们的子弟全是读的自读。请万勿认为受洋人的支使所为。”对于就读华西学校，目的是“认真多读点书”，“求学业进步，达学术救国”。^①对于外界强加于身的“帝国主义鹰犬”的辱骂，学校师生表示不敢苟同，他们自信“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，自我们的祖宗到现在，算来有四千年，爱国的心，恐怕人人细胞里，都含得有的，而且是很深很热”。这些学生宣示“我们在教会学校读书，还是中国人”。^②

2. 对于“文化侵略”：对于外界所指一入华西学校，即是“作外人之走狗，受文化之侵略”，学校师生以文化为世界公器作辩，中国欲物质文明，教育进化，“当此时际，非欧美人士不足灌输，抑非传教者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”。^③对于外界抨击教会学校率多“弁髦国粹”，他们回应全系捕风捉影，并无实据，并举证该校的国学教授皆系省中名流，同时兼授省城各校，“是本校国文想与城中各校无殊，何得谓弁髦国粹。”^④

3. 对于“宗教麻醉”与“奴隶人才”：对于教会教育是“宗教麻醉”，他们认为这是攻击者“不知道基督教中的精神和毅力，更不明白教会学校对于现今中国和国民的关系”；还有人以宪法作武器，“教会学生，不尽皆信徒，况信教自由，载在宪法，虽政府不能有所强，彼何人斯，而欲抢夺人权，此民主国家未有之事也”。^⑤对于教会教育是“奴隶教育式”，所造就者为“奴隶人才”，他们列举了一批出身教会学校的中华名人，如容闳、孙中山、孙科、伍廷芳等，“皆由基督教宗教教育灌溉而成者”，以此反唇相问“果系中国奴隶人才耶？”^⑥

4. 对于收回教育权：他们质问何为收回？该如何收回？收回后拿什么去继续办理？倘若就目前现状收回华西协合大学，遑论发展，维持亦难。他们所赞成的收回办法，一是外人所办学校，依照教部定章办理，并报部立案，受政府的监督；一是完全接收，所有人才经费，完全由本国人负责；还有，则是“彻底的收回法”，“使国立与省立的学校，经费完全独立，办理得比西人的学校更完善。那时所有的教会学校，恐怕不待打倒即自倒闭了”。^⑦

(二) 中国群体：为自救而自省

“自修以止谤”，中国师生认为学校向来“独囿一隅，盲为措置”，以至于一波未平，一波复起的境地，因此提出了解困的方式。

1. 万不可倚仗不平等条约：有中国教员明确指出，基督教乃是“赖刀兵迫取之约章而传布”，认为在中华民族觉醒的今日，“此种约章乃教会之仇敌，其毒甚于魔鬼，应群起而求废除之。万不可倚仗从前所订不平等条约，以为中国政府无权干涉，自居例外，致引起中国知识界极重的反感。”^⑧

2. 从速向政府立案：教会学校未经向中国立案而设立，“既侵犯主权，更贻误青年学子”，

①⑦ 《一部分华大学生的家庭宣言》，《华大学潮特刊》，1926年出版。

② 邓永龄：《华大学潮之起因及其经过》，《华大学潮特刊》，1926年出版。

③⑥ 海外归来客：《对于基督教教育权收回之我见》，《华西教育季报》第3卷第3号，1925年9月出版。

④ 持平：《华西大学是否文化侵略的机关》，《华大学潮特刊》，1926年出版。

⑤ 余天锡：《与退学者言》，《华大学潮特刊》，1926年出版。

⑧ 萧崇礼：《基督教教育家的反省》，《华西教育季报》第3卷第1号，1925年3月出版。

“学校既未经官厅认可，则毕业于此等学校之学子，不能得其种种应享之权利”。^① 提议学校当局从速设法，使立案成为事实。

3. 摆脱外人包办：大学历来由西人治校，间有一二华人加入理事会，只会做“橡皮印”而已。为改变这样的局面，中国师生提议：校长必须有一人为中国人，始知中国国情及教育宗旨，方不至于国民性之发扬、国民情之融洽有所阻碍，且合教育部规定，以便立案；董事会中国人应占半数，方不至有外人包办之误会。

4. 不得强人必修宗教：繁杂的神学课程，古板的礼拜讲演，令中国学生对宗教教育“面从心违，始疑终谤”，政府通令不得强迫学生必修宗教，也得到了学生的支持。他们说“信教自由，彰载约法，故不得于校中，强人人必修，以与约法相背。”不必勉强非信徒参加礼拜，要让学子对基督教“心悦诚服，信从真道”。^② 除建言献策之外，中国人士更因危机而行健。1927年约有半数在华教士被迫撤离中国，留下的西国教士，多半转往沿海的几个大城市中。值此变故，华人因西人的离去而多担一份责任，一批中国领袖也因此脱颖而出，教会的各项事业经华人的办理执行，更显通达和顺。

（三）学校当局：从获准“备案”到完成“立案”

对于中国政府的立案法令，西国教士有所预感：教会学校获得政府承认的时机“早迟定必来到”，并不认为那将是末日，如1917年华西基督教教育会总干事吴哲夫（Edward W. Wallace）谈到，“一经政府承认，多与之联络，必少阻碍，而得大助，并免有人云基督教所办学堂为洋学堂，所教人才与本国道德相背。”^③ 然而，西国教士总是等待更晚、更有利的一天，每每使立案一事节外生枝，解决不下。1925年“五卅惨案”发生后，在华西坝引发过退学风潮，在庆幸学校“以伟大的智慧转移了敌视”之后，1926年6月大学在纽约的董事部通过宣言：

此大学乃因基督之名，为华人而建设的，甚望不久即变为纯粹的中国机关，归中国教会主持。凡管理行政及维持，均由中国人支配……左列条件，本部一概赞许：1. 向政府立案。2. 依照教育部所颁大学之规定办理。3. 注重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。4. 各科暨理事部渐次增加中国人。^④

此一宣言在中国基督教大学中可谓开一先河，确认了该大学乃是由中国人所享，归中国教会所治，属中国教育部管辖，依附于中国文化的中国大学。但是，本地教会及学校相关人士的歧见颇深，认为过快移交权力与过去试图保留权力同样危险。

1926年的“九五惨案”引发的学潮和工运，“几乎把我们摧毁掉”（毕启），同年11月，大学理事会表决通过了申请“政府认可”的决议。随后政局突变，“学校风潮起于前，国际问题生于后，西教授纷纷相去，势将瓦解，中国同人不能不相与维持，出而组织之”，^⑤ 华人张凌高被任命为副校长，具备了申请立案的条件。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各自发布了《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》与《私立学校规程》，两相权衡之下，学校更乐意接受北京政府的条款。经开会讨论，往复磋商，时逾一年，始决定向四川教育当局申请立案。1927年10月副校长张凌高呈文教育厅，按照《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》，本校应有改组之必要，但在中国校长和中国董事过半问题上，请求政府变通处理，如关于设立中国校长一项，呈述理由如下：

因正校长毕启为董事部推任，且系学校创办人，品望学术均为中外人士所信任，现已往

① 萧崇礼：《基督教教育家的反省》，《华西教育季报》第3卷第1号，1925年3月出版。

② 何文俊：《留校学生与今后学校应有之方针》，《华大学潮特刊》，1926年出版。

③ 《华西教育会总干事报告书》，《华西教育会年会书》，1917年版。

④ 樵：《华西大学董事部宣言》，《华西教育季报》第4卷第2号，1926年6月。

⑤ 《华大概况》，《华西校刊》，1927年出版。

欧美为本校募集巨款,以备扩充之用,因此未便骤予变更,始由董事部于本校教授中选举中国一人为副校长,用符部令。^①

1927年12月,四川省教育厅代理厅长万克明呈文省长公署:查核华西协合大学科目及一切设施,大致尚合,惟以外国人为正校长、中国人为副校长一层,与“学校校长不得以外人充任”规定微有出入。^②1928年1月,代理厅长向楚签发教字第822号令,准予华西协合大学先行备案,以待查核立案。与国民政府就最终地位的商谈,又拖了数年的时间。1928年6月,大学接令须按《私立学校规程》重新改组,对于其中的“排外”条款——须设中国校长、校董会外人不得过半等,经大学理事会讨论后认为,凡此种种,非一时所能猝办,遂拖延下去。1930年《教育部布告第七号》的发布,关于未立案学校在校学生转学、升学无门,毕业生的公务员考试、医生许可也被剔除在外,令学校上下惶恐不安。6月11日,加籍教授曾思孔(W. B. Albertson)向董事部发去电文:“学生会强烈地催促你们必须注册,否则我们面临着被强制关门的危险”。^③国内其他教会大学多已在1931年前获准立案,而教育部设定的立案最后期限(1932年6月)已逾,可谓情势危急、咄咄逼人。1933年9月23日,四川省教育厅接教育部指令:私立华西大学应准予立案。

(四) 西国教士:对于“权力移交”与神学退位的妥协

不论是北京政府的“认可办法”,还是南京政府的“立案规程”,政府对于这些条例的解释,虽然是很宽容的,可是从教会学校本身看来,却发生了严重的政策问题,问题集中反映在以下两个范畴:

首先,“权力移交”问题。大学校长由中国人接任,出自政府明确的“排外”条例,教会所能考虑的只是赋予中国校长怎样的“权力”,通过考察其他教会大学,华西决定采用燕京“校长-校务长”模式:燕京大学由美国人司徒雷登任校务长,另外选举中国人吴雷川为校长。表面看去后者职务更高一些,仔细分析后发现,司徒雷登的校务长职务,英文是President,而吴雷川的校长职务,英文则是Chancellor,西洋大学Chancellor乃荣誉之职,并不负责校政。1931年5月学校当局征得纽约董事部同意后,推荐华人张凌高出任校长,原美籍校长毕启改任校务长。按修订后的大学章程规定,校长由校董会推选中国人充任,综理全校事务,并照燕京大学之例,设正副校务长各一人,由国外托事部(由国外董事部改组而成)推任,办理大学与托事部相互间事务。与燕京大学略有区别的是,张凌高的校长职务,英文为President,毕启的校务长职务,英文则是Chancellor,虽然中英文词义相符,但实际权责并未到位。设校务长一职,本非教育部规定,“实因本校系私立,创设人即托事部多在外洋,校务长即其代表也,又因本地校董会负本校进行之全责,故校务长者即为托事部与校董会二者之联络也”,^④校务长在行政上具有相当权责,尤其在财政上负有全责。

其次,关于神学教育的地位问题。虽然教会学校表明愿意向政府立案,但要求取得传授宗教的自由权,而政府却明令学校教育与宗教相分离,甚至传言称政府欲严厉取缔宗教教育,因此遭到教会方面的强烈反对。华西教育会总干事吴哲夫形容说:“俗语说‘尾上一刺’,基督教学校注册的困难,就在末一条。禁授宗教科目,不但违反宗教自由原则……与民治主义的国家教育趋势不合”。^⑤在国民政府有关立案细则颁布之后,他们发现政府并非是全面禁止,而只是有条件的限制后,学校仍然可以通过课程改良和选修科目继续神学教育,教会人士也不再强烈反对注册

① 《呈为遵令立案呈请核转事》,华大档案·“立案”。

② 《四川省教育厅就华西大学立案事呈省长公署文》,华大档案·“立案”。

③ 《四川省教育厅训令第1479号》,华大档案·“立案”。

④ 《华西协合大学设计委员会报告书》,1936年版。

⑤ 吴哲夫:《基督教教育当前问题》,《教育季刊》2卷1期。

立案,也不太在乎对办学宗旨进行世俗化的修改。一些教会人士认为学校的基督特征以及“特殊作用”,不是取决于任何宗旨声明,而是那些负责指导、行政和教学的人员的品格和信念,完全可以通过人格感化,以及选修课的引导,宗教活动的熏陶,同样能够保持学校的基督教性质。经过对学校立案后的观察,1936年美籍教授周忠信已有信心地说:建天国于斯土的宗旨被“固定地保留了下来”,“不论是受到顽强的对抗,还是得到民间及官方的推崇赞许,这所基督教大学始终如一地忠于它的宗旨——建立天国。”^①

五、小 结

进入20世纪20年代,受环境“逼迫”和法令强制,在“内外夹攻”“死运将至”的穷途中,基督教大学不得不接受政府法令而开始改组,顺应国民的呼声进行革新。通过向政府注册并获准立案,确立了私立大学的身份,较大限度地化解了政教冲突,改善了社会关系。对外人在华设立的教会学校,采取改组和立案来加以接纳,而不是“听之任之”或“收回自办”,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、政治背景和时代特征的,也有利于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需要,有益于教会学校特殊价值的充分体现。

对教会教育与教会学校,当时各方存有各种兴废存亡、破旧立新的选项判断,主要有三种论点:其一,出于对教会权益的坚持,以及对学校质量的自诩,竭力保持教会学校的完整性和独立形态,这代表了教会内“保守派”的意见,他们有的以“约章”“宪法”来标榜教会学校的合法性,有的以“教化”“归化”来标榜教会大学的特殊作用,意以为基督教教育乃尽善尽美之教育;还有则以“文化先进”“科学完备”标榜教会大学的优越性,意图保持其在中国恒久的地位。其二,教会自行关闭或外部摧毁教会学校,这既来自教会内的保守势力,也来自“非基”“反教”的激进势力,前者定位于教会学校已失去了在中国继续存在的意义,后者定位于教会学校对中国的危害和危险。对于教会内的保守人士来说,在无法保持教会学校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情况下,自行关闭或停办学校是选项之一,如之江大学是惟一曾于1928年被关闭的教会大学。而激进的反教人士则希望借助收回教育权运动,将教会学校一举摧毁,将教会教育驱逐出境。其三,限制或改造教会学校,使其既服务中华,也服务上帝,这是前两种对立论调之外的一条“折中”的选择,教会学校价值与瑕疵集于一身,应当取其利,避其害。就当时来看,完全停办和收回教会大学,既不符合实际,也不利于中国教育的发展,一些教会学校也办得有声有色。同时,教会大学的弊病在其本国也是存在的,而在中国尤有不合时宜、不近国法、不合民意的不当之处,故须将其作出相应的调整适应,避去沾染外国的流习,遵守政府所定标准,那么教会学校与中国学校,可以并行不悖。

1925—1933年,华西协合大学从“充满暗礁的航道”中驶出,成为中国教育系统的一部分,初步确立了它的本土身份——中国私立大学,成为大学赢得信任和尊重的重大转折。在继后的近二十年中,教会学校也在本土化、专业化和世俗化的进步中,渐变成为中国永久的事业,它们多以学风纯朴、设施完备、水平较高闻名。1950年后,虽然华西协合大学作为教会大学宣告消亡,但学校实体被改造转化为公立大学,从而以中国的永久大学而长存。

(责任编辑:袁朝晖)

① J. Taylor, *History of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(1910—1935)*, pp. 16—17, p. 35.